

邓联健
赵东焯
广西大学

论译本以文释图的阈限空间*

——以 *David Copperfield* 四个中译本为例

【提要】插图文本的翻译同时涉及语际和符际翻译。因文本中插图与文字所表述的信息可能存在出入,译者可借助插图对原文文字表述进行增删,实现以文释图目的,但须遵循合法阈限,即让语际翻译占据主导地位。在合法阈限内,遵循“以文为主”原则,译者可依插图确定词义、借插图增补文义。如若“以图为主”,凭读图来新生文义,则会进入以文释图的非法阈限。

【关键词】翻译、以文释图、《大卫·科波菲尔》、非法阈限、合法阈限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648(2022)02-0012-07

DOI:10.19502/j.cnki.2095-9648.2022.02.002

1 引言

翻译通常被视为语际间文字意义的转换。然而,除文字外,依据情节绘制的插图也是文本的常见构件,文字和插图两种模态相互依存,相互约束。这让翻译过程变得更为复杂,给译者带来挑战。尽管许多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各符号间的关系,但传统研究视角往往集中于语言和文化层面(Gambier 2009:17)。随着多模态翻译研究的开展,“跨越语言与文化界限的符际翻译”逐渐得到重视(Wang 2009:41-42),有学者开始尝试从符际层面阐释插图对文本意义建构、转换的作用和重要性。例如,研究者认为符际翻译在语义、语篇、文化等层面为译者提供了生成译文的线索,便于译者细化理解、扩展构建译文的思路和想象空间(林元彪 2016:146)。此外,符际层面的绘画阐释有助于展示译作背后的静态艺术之美(杜雄、李维佳 2020:117)。笔者遗憾地发现,插图往往被研究者用作译者改易原文的借口,语际层面的讹误在符际翻译视角下常被视为创新。符际翻译中以文释图的运用效度尚未引起翻译界和翻译研究界的充分重视。由于任何一种传播媒介既有自身优势,同时又有其非自足性,译者从插图的视觉线索出发,可能会偏离甚至背离原文。因此,在涉及符际翻译的文

本翻译中,需要对以文释图的限度作出合理界定。

本文选择狄更斯所著 *David Copperfield* 的中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三个考虑。一是该著原文插图数量达 39 幅,能为译本的符际翻译研究提供较为多元、可靠的例证;二是这部作品在中国译介时间较长、译本数量较多。本文选取四个代表性译本,包括由林纾、魏易合译本《块肉余生述》(1981)、董秋斯译本《大卫·科波菲尔》(1980)、张谷若译本《大卫·考坡菲》(1996)以及庄绎传译本《大卫·科波菲尔》(2003);三是四位中译者分别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插图处理方式,董秋斯、张谷若、庄绎传选择保留原文插图,将原语文化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林纾、魏易则参考插图,将原语符号信息转换成译语文化信息。按照 Jakobson (2000:114)划分的翻译类型,董秋斯、张谷若、庄绎传译本属于纯“语际翻译”,林纾、魏易译本则涉及“符际翻译”。

本文拟首先比较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异同,着重分析符际翻译的以文释图效果。随后,从符际层面观照林纾、魏易的翻译,笔者发现译者依据原文插图产生三类翻译决策:依图确定词义、借图补充文义和读图生义。最后,本文基于案例探讨插图与文本的等级关系,在符际翻译观照下建构以文释图的阈限空间。

* 本文系 2021 年度广西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典籍外译图文互释效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YCSW2021005。

2 以文释图的合法阈限一:以文为主,依图像确定词义

多义性和抽象性是英语词汇的重要特征,因此,选择和解释英语词义对译者的表达能力构成了一大挑战。通常而言,一个词语在语篇中的含义来源于该词与相关词语之间的连贯关系,对词义的成功解读和体现取决于对这一关系的重构(王东风 2005:38)。因此,在英译汉的过程中,消除歧义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照上下文的语境推理。

在有插图的文本中,插图和文字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读者可从插图中看到人物细微的神情举止、看到人物所处的背景环境、看到人物周边的道具布置,由此推测故事的主要情节发展(于洋欢、董雁 2020:132)。因此,符际翻译可能为译者提供了新的翻译视角。

2.1 插图与词汇多义性

英语是一种以多义词为主导的语言,当相关情节存在语图关系时,插图信息可以为译者提供参考,帮助译者确立词汇的语义指向。

例 1: ... a hairy man with a very good-natured face, came home. (Dickens 1890:64)

董译:一个面貌很和气的多毛的人回来了。(董秋斯 1980:38)

张译:一个满身毛烘烘、满脸笑嘻嘻的大汉走了进来。(张谷若 1996:51)

庄译:一个面容非常和蔼、身上长着许多毛的男人回来了。(庄绎传 2003:32)

林、魏译:……忽见有人髭绕其颊,状貌颇和蔼,贸然入船……(林纾、魏易 1981:17)



图 1 I AM HOSPITABLY RECEIVED BY MR. PEGGOTTY

外貌描写重在以“形”传“神”,通过描写人物独特的外貌特征,间接塑造人物的性格特征、思想品质和精神风貌。狄更斯擅长通过简明的人物外貌描写凸显其性格特征,借助外貌描写完成人物性格塑造。原文此处描述了 David 初见 Peggotty 的印象,通过 hairy 和 good-natured 二词强调了坡勾提的外貌特点,间接揭示了其憨厚温和的性格。

英语的 hairy 是个多义词,《英汉大字典》释意包括“多毛的”“似毛的”“长有绒毛的”,甚至“惊悚的”等等(陆谷孙 2007:844)。由于原文的同现词项为 man,因此限定 hairy 的语义范围为“多毛的”。董译、庄译和张译将 hairy 作单义化处理,分别译为“多毛的”“长着许多毛的”和“毛烘烘的”。虽然这样的处理实现了英汉两种语言字面上的对等,但读者的想象可能因此受到限制,难以形成清晰的人物形象。同时,“多毛的”也难以形成对人物性格的描绘,丧失了作者通过外貌描写暗示人物性格的意图。此外,西方文化中的 hairy 往往指男人的胡子茂密。例如莫泊桑(2012)在短篇小说《八字胡》(The Mustache)中就将“多毛的男人”(the hairy man)定义为“不刮胡子”(does not shave off his whiskers)。因此,直译为“多毛的”男人无法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而林纾、魏易译文中的“髭”字,将抽象的“脸上很多毛”具体化为“浓密的胡须”,“绕其颊”又将“胡须”进一步具体化为“络腮胡”。在文艺创作中,人物刻画往往具有公式化、脸谱化倾向,对胡须的描写也是其中之一。作为男人特有的标志,不同样式的胡须往往被用于构建与众不同的自我形象(王小荭 2002:102)。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张飞、李逵、樊哙、鲁智深等人物都留有络腮胡,林纾、魏易如此译 hairy,可能意在表现 Peggotty 豪爽、憨直的性格特征。因此,在中国读者的脑海中,坡勾提“髭绕其颊”虽然不甚“温和老实”,但也算“性情中人”。从效果上看,林纾、魏易这样的处理进一步揭示了词汇内含的文化意义。

可问题是,林纾、魏易何以能将 hairy 具体化为“髭绕其颊”?对照插图 1,林、魏译“髭绕其颊”与插图正中男人的胡须样貌吻合,因而可以判断林纾、魏易这一操作是根据插图改译的。在跨文化语境中,符号系统可以在关键点以视觉手段激发译者的文字创造力、锚定译者的空间想象力,协助

译者揭示原文中的文化线索。在不违背原文的基础上,符际翻译不仅为文字表达带来了立体感、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也强化了图片与文字的互文互证的解释效果,更好地保留与传递了原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内涵。

2.2 插图与词义抽象性

由于中西表达习惯迥异,英文中的大量抽象名词,往往难以用汉字对应翻译,相反,汉语中许多具体的词也难以在英文中得以体现,如果我们生搬硬套地进行翻译的话,势必会使译文晦涩、费解(张海涛 1999:22)。而当文本中存在插图与文字互为补充时,译者则可以借助符号系统更好地实现跨文化想象(见图2)。

例2: The twins testified their joy by several inconvenient but innocent demonstrations. (Dickens 1890:836)

董译:双生子用几种不适当但没有恶意的行为表示他们的快乐。(董秋斯 1980:878)

张译:那两个双生儿,就作了好几种笨手笨脚但却烂漫天真的表现。(张谷若 1996:1113)

庄译:那对双胞胎用了一些笨拙但是天真的动作来表达他们高兴的心情。(庄绎传 2003:770)

林、魏译:二小儿见状则狂跳为乐,此二孪生之儿,两人分引其父母之裾,不知所谓。(林纾、魏易 1981:429-430)



图2 RESTORATION OF MUTUAL CONFIDENCE BETWEEN MR. AND MRS. MICAWBER

狄更斯用 *inconvenient*、*innocent* 形容孩童的动作,刻画人物的情感特征。英语的 *inconvenient* 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英汉大字典》释意为“不方便的”“打扰的”“令人难为的”(陆谷孙 2007:959)。在跨语言转换中,面对抽象的英文表达,四位译者均放弃字面意义的对等,倾向于表达 *inconvenient*

隐含情感、态度的内涵意义。董译、庄译和张译为了重现孩子的天真烂漫,将 *inconvenient* 译为“不适当的”“笨拙的”。通过分析文本语境实现语义对等,不仅使读者如闻其声、如睹其容,还成功传达孩童独特的天真活泼形象。

林、魏译则具体描绘动作,将原文译为双生子“狂跳”以及“引其父母之裾”。—“跳”—“引”,丰满了孩童个性的同时,也重现了作者的儿童形象建构。比对林纾、魏易译文和狄更斯原文及插图2,“狂跳”以及“引其父母之裾”在原文文字表述中均无影踪,但却符合插图所绘双生子的动作。不难推断,这是林纾、魏易根据插图将原文的抽象描述改译成了具体的行为动作。林纾、魏易认为,中国读者更习惯于具象思维方式,借助符际翻译将原文的抽象表述具象化,可以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隐形壁垒。在符际翻译中,虽然译者更改了原文,却重现了有血有肉的人物,为译文注入了生机。

通常来说,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译者从文本建构的语境出发,厘定词汇可能蕴含的意义。林、魏译则从图像出发推断文字可能牵连的意义。翻译策略虽有不同,却均避免了生拉硬套的翻译,解释效果可谓是平分秋色、难有优劣之分。甚至可以说,以文释图不失为一种确定词义的有效路径。

3 以文释图的合法阈限二:以文为主,借图像增补文义

图像本身并没有一套成型的语法规则,“语言所指与图像能指很难形成直接的对应,此时的语言符号更多体现着对图像释义的一种‘启发’机制”(张伟 2020:175)。在原文文本中,作者所使用的语法规则的文字表达往往只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在涉及方位和距离等概念时,文字表达通常只用于大致描绘故事场景。在这样的情形下,译者可以接受插图的“启发”,将文本中的抽象描写具象化,降低文字文本的模糊性。

3.1 借插图强化逻辑链

一般而言,译者会通过语境来推测词义,但语篇层面的推测往往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受译者文学素养和表达能力高低的影响,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描述可能存在欠缺。图像具有形象直观和表意迅速的视觉优势,传达的形象和感受比文字形式更加丰富。通过增译插图信息,译者可以形象化

地放大文本信息,使读者更清楚地体会插图与文本之间的逻辑关系。

例3:“Have you got your flute with you?” … “Have a blow at it,” said the old woman, coaxingly. “Do!” The master…began immediately to play.(Dickens 1890:110)

董译:“你随身带来你的笛子吗?”……“吹一次吧,”那个老女人甜嘴甜舌地说道。“千万!”于是,教师……立刻开始吹奏了。(董秋斯 1980:89-90)

张译:“你的笛子带来啦没有?”……“你吹一吹我听听吧,”那个老太婆哄着说。“吹一吹吧!”教师听了这话……跟着就吹了出来。(张谷若 1996:115-116)

庄译:“你带笛子了吗?”……“吹上一段,”老太太怂恿他。“来吧!”老师一听这话……就吹起来。(庄绎传 2003:76)

林、魏译:“尚携笛于衣底否?”……媪与教习甚昵,即曰:“试吹此笛娱我。”教习……吹之。(林纾、魏易 1981:42)



图3 MY MUSICAL BREAKFAST

原文中,狄更斯仅用 *coaxingly* 一词即精准地捕捉到了人物一闪即逝的心灵波动。*coax* 一词包含了“哄”“劝”“诱”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董译、张译和庄译注意到了 *coaxingly* 一词内含的权力与距离关系,分别译为“甜嘴甜舌”“哄”和“怂恿”,只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语际层面的对等。对于译者而言,如何把握这一表述的“社交距离”也是一大难题。

老妇人与教员的社交距离和心理描写是互相验证的关系,祈使句的短与长体现了谈话双方的社会距离或者说亲疏关系(严辰松 1997:23)。无论是老妇人对教员擅笛的了解、请求用语的直白,

还是教员吹笛行为的干脆,都可以推断出两人早已熟知多年,关系十分亲近。

林纾、魏易另辟蹊径,将 *coaxingly* 翻译为“甚昵”。他跳出了词义的禁锢,反而着重于描述两人的社交距离,以“二位关系亲昵”将“哄”“劝”“诱”三种心理状态都囊括其间。通过对人物社交距离的描写,反映了人物的内在的隐秘情绪。显性的词义和隐形的距离都内化在了林纾的翻译中。

图3明示了老妇人、教员和 David 所处的社交距离,因此林纾、魏易在翻译过程中可能直接参考了图片信息。由图可知,大卫与老妇人和教员的距离较远,指明 David 与二人只是萍水相逢的关系。而老妇人则面对着教员而坐,眼光也看着教员的笛子,可以合理推测出两人之间关系亲近。

原文的用词可能包含多重词义,其具体意义随着不同的社交关系或情景语境而变化。符号系统将“距离”明示,使译者对语境形成直接印象、以更好地选择合理的翻译策略。插画家可以将书中描绘的事件、情节连成一体并绘制成画面,通过生动形象的线条明示言语间隐藏的逻辑。虽然林纾、魏易根据插图改译了原文,但这类增译的目的并非改写原文,而是为了揭露文本的隐含逻辑、增加故事的生动性和艺术魅力,让读者获得更为流畅与持续的沉浸式阅读体验。

3.2 以文为主,基于图像增补信息

由于插图解读往往具有开放性,因而拥有比文字更大的阐发空间。译者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选取插图的部分符号信息,对文字所传递的信息进行补充。

例4:…Traddles was so hemmed in by the pagoda and the guitar-case, and Dora’s flower-painting, and my writing-table…(Dickens 1890:709)

董译:……特拉德尔被高塔、琴匣、朵拉的绘花架、我的写字桌围困得那么厉害……(董秋斯 1980:743)

张译:在我请特莱得吃饭这一回,因为又是吉卜的塔形狗窝,又是吉他的盒子,又是朵萝画的花儿,又是我的写字台,他挤在这些东西的中间……(张谷若 1996:942)

庄译:……特拉德周围又是宝塔,又是吉他盒子,又是朵拉画的花卉,又是我的写字桌,把他挤在中间……(庄绎传 2003:648)

林、魏译:此时忒老特尔司坐处左逼于吉迫之塔,右逼于都拉琴匣,背后则为余写字台所格,而都拉画案又逼据中枢。(林纾、魏易 1981:361)



图4 OUR HOUSEKEEPING

狄更斯这段文字简单罗列了狗窝、吉他盒、写字台和画案等物品,完成了文本意义的建构。董译、庄译和张译此处的处理忠实于原文,而林纾、魏易译本借助插图强化了文本信息的逻辑关系,增添了对四个物件的具体方位描述,即“右琴匣,左狗窝,中画案,后靠写字台”。原文并未交代各物件的位置及其缘由,但译者结合符号信息,对特拉德尔所处的环境进行了更详细的描绘。由此,家中空间的拥挤杂乱、David的深沉爱意、Dora的不善家务和Traddles的善解人意皆跃然纸上。由此可见,在文本既定框架不变的前提下,译者主动对插图提供的额外信息进行借鉴、转换和融合,既可以保证原文的“文心”不被遗漏或曲解,又达成了译文逻辑的自洽。

因此,从符际翻译的角度看,制图者和译者有着共同的理解目标:把握原文的方方面面。在保证原文信息不被曲解的情况下,译者通过阐释图像对文本意义进行补充、延展,不仅可以强化行文逻辑,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生意义,也有助于译者弥补文字可能存在的非自足性,揭示文字表达可能蕴含的信息、情感和意义。

4 以文释图的非法阈限:以图为主,读图生义

上文所述林纾、魏易独特的释图方式表明,符际层面的阐释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同样是一种合理的翻译策略。因为,图文之间的不一致性,常能让译者在目标语文本中塞入信息,将原文中只是通过图片而非文字表达出来的内容在目标语译文中用文字表达出来(李宏顺 2014:67)。值得注意的是,当符际翻译脱离语际翻译而独立作用

于译文时,插图所提供的译文线索、行文思路以及想象空间,往往不一定十分可靠。

4.1 静止的插图与动态的内心活动

由于插图所建构的语境是片段化的、不完整的,译者可能无法根据插图中人物定格的举止,对话语发生的动态情景进行连贯解读。

例5: That at this sight Mrs. Markleham dropped the newspaper, and stared more like... (Dickens 1890:725)

董译:……马戡太太抛下了报纸,目瞪口呆……(董秋斯 1980:761)

张译:马克勒姆太太一见这种光景,报纸落地,两眼直瞪……(张谷若 1996:964)

庄译:马克勒姆太太见此情景,丢下报纸,呆呆地看着……(庄绎传 2003:664)

林、魏译:老军人方读报,即骇然置报纸于裙幅之上。(林纾、魏易 1981:371)



图5 MR. DICK FULFILS MY AUNT'S PREDICTION

“Mrs. Markleham dropped the newspaper.”一句,展现了老太太惊诧之际报纸从手中落地的过程。对这个十分短暂的过程,四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董译和庄译取 drop 的起点,分别译为“抛”“丢”。而张译则取结点,译为“落”。但“抛”“丢”“落”均属于以点代面的描写,这样的描写可以令读者捕捉到动作的细微变化、感受人物受惊的状态。除此之外,在选定 drop 的词意时,译者也需要注意把握人物的心理状态。结合后文“这时恢复了说话力而且似乎以家族的骄傲与作母亲的尊严而自负的马戡太太”(董秋斯 1980:761)。可以看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可以概括为从“惊诧”转变为“愤怒”与“羞愧”。虽然译文的主语不甚相同,但“抛”和“落”二词均表现了 Markleham 太太呆若木

鸡的状态,以至于报纸都从指间滑落。这无疑强化了人物动态的心理变化。

林纾、魏易将此句译为“置报纸于裙幅之上”。对比原文,一则 drop 并无“置……于……”之意,二则句中全无“裙幅”细节。不过,观察插图 5 可见,左侧一位女士坐在椅子上,面露惊诧之色,手持报纸,报纸末端与裙子重合。由此可见,译文此处的讹误是由于林纾、魏易着眼于符际层面的阐释,而忽略了原文的动作描写。研究者虽可用符际翻译合理化林纾的翻译行为,但不可否认,“置”与 drop 折射出的人物心理状态迥然不同。较之于“抛”“丢”,“置”暗示 Markleham 太太仍然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动作,说明人物仍然保持着理智,消解了“骇然”所表达的瞠目结舌的意味。

插图只能定格某一瞬间的情况,并不能展现真实情形的变化过程。drop 为瞬间动词,动作从开始到结束所持续的时间极短,无法被插图完全捕捉。Wolf (2005:432)认为:“单幅单相图像并不能真正描绘情形的变化,而仅能予以暗示,所以读者必须进行推导,因而图像叙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文字叙事则更加清晰。”综上所述,林纾、魏易根据插图将 drop 译为“置”脱离了文本和词义,仅凭插图信息进行文意解读,这样的译法显然有失妥当,属于符际翻译的不合理运用。

4.2 静态的插图与流变的情感

由于插图所建构的语境是有限的,甚至是与文字不兼容的,译者根据插图中人物的瞬时状态翻译原文时,有可能对读者理解情节构成阻碍。

例 6: Master Micawber, whose disposition appeared to have been soured by early disappointment, and whose aspect had become morose, yielded to his better feelings, and blubbered. (Dickens 1890:836)

董译:密考伯少爷的性格似乎被早年的失望变阴沉,他的神情也变乖僻,这时居然恢复了本性,痛哭起来了。(董秋斯 1980:878)

张译:米考伯大少爷,本来有些因为早年老受挫折而性情乖僻、面目抑郁,现在也感动了天性而大哭起来。(张谷若 1996:1113)

庄译:米考伯少爷虽然似乎因早年受过挫折而脾气不好,抑郁寡欢,现在也受了感动,大哭起来。(庄绎传 2003:770)

林、魏译:即其大儿亦默然不复躁动。(林纾、魏易 1981:430)



图 6 RESTORATION OF MUTUAL CONFIDENCE BETWEEN MR. AND MRS. MICAWBER

狄更斯仅用一句简短的描写,展现了 Micawber 少爷幼时经受的精神折磨与如今心理被治愈的感动。董译、庄译和张译忠实于原文,译出了 Micawber 少爷从忧郁到大哭的情感转化。而林纾、魏易只译出大少爷“不复躁动”,却遗漏了“喜悦的泪水”,逻辑链条戛然而止,读者必定感到一头雾水。除无意笔误外,林纾、魏易此处的讹误也可能来源于符际翻译的使用。插图 6 中,左侧第一位男士面露忧郁之色,与其他欢欣雀跃的人物格格不入。可以推测,此处林纾、魏易译“默然不复躁动”也参照了插图的信息。

毫无疑问,符际翻译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仅关注符号信息也可能导致译文出现逻辑混乱的情况。究其原因,图片是静态的、片段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再现部分情节、展示某一瞬间的情绪。单纯依靠插图进行翻译,会令译者难以把握情绪的流动与变化,以至于一叶障目。由于符际网络具有指向性和具体性,符际翻译独立展开时会诱使译者超越文本自身的既定语境。而译者的基本任务在于尊重原文内在的含义,重现原文的态度、逻辑和文化,对原文确证不变的意义给予尊重。任何抛弃原文文本的符际层面的观照,都会导致译文的意义建构无法触及原文意义的本质内涵,渐而消解符际翻译的阐释力。在这种情况下,符际翻译不仅失去了增强艺术特色的优势,反而令符号信息变成了累赘,符际层面的理解和阐释也冒犯了原文。

5 结语

通过分析 *David Copperfield* 的四个中译本,本文发现语际翻译与符际翻译存在等级差异性。当语际翻译占据主导地位、符际翻译位于从属时,插图对辅助译者想象、开发译者多模态翻译能力、强化译者主体性具有较大的潜在价值。而当符际翻译独立于语际翻译单独展开时,译者可能会丧失在翻译实践中进行自我修正的契机,在这样的情况下,译文将沦为对文本之外的他物的理解和阐释,与原文内生的意义也貌合神离。

虽然符际翻译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层面,而更多地属于表演或艺术创作的范畴(龚晓斌 2013:19),但在传统文本中,译文仍然会受到符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种张力的影响。只有以文本内容规约符号系统,才能让符号信息成功转化为符合文本语境的话语因子,从而激活译文的想象性、创造性和审美性,这才是符际翻译在合理阈限空间建构意义的合法性所在,也是实现以文释图的理性策略。

换言之,在符际层面的翻译批评中,符际翻译对文本进行补充、延展意义的前提都是基于文本自身的,如果译者依据插图主观增改的信息没有背离文本的既定框架,构建译文的思路和视觉线索就应该能够被理解并得到尊重。否则插图不仅不能强化文本的内生逻辑,也消解了文本的文化精神与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合法的符际翻译必须受到语际翻译的规约,只有如此,译者才能有效整合文字和图像两类符号,构建坚实、可靠的以文释图翻译路径。

参考文献

- Dickens, C. & H. K. Browne. 1890.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David Copperfield* [M]. Philadelphia: T. B. Peterson & Bros.
- Gambier, Y. 2009. Challenges in Research on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J]. *Translation Research Projects* (2): 17-25.
- Jakobson, R. 2000.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In L.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 [C]. London: Routledge: 113-118.

- Wang, N. 2009. An "Iconological Turn"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Visual Culture [J]. *Semiotica* (176): 29-46.
- Wolf, W. 2005. Pictorial Narrativity [A]. In Herman, D. et al.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C]. 431-435.
- 董秋斯, 1980,《大卫·科波菲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杜雄、李维佳, 2020, 翟理斯译诗艺术的语际观照与符际阐释[J],《外国语文》(4): 113-121。
- 龚晓斌, 2013, 文学文本中的视觉翻译[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 李宏顺, 2014, 国内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及展望[J],《外国语文》(5): 64-72。
- 林纾、魏易, 1981,《块肉余生述》[M]。北京:商务印书馆。
- 林元彪, 2016, 从“插图”看林纾翻译的视觉线索——兼议“构图思维”与翻译过程[J],《中国外语》(4): 97-106。
- 陆谷孙, 2007,《英汉大词典》[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莫泊桑, 外研社编译组译, 2012,《情为何物》[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王东风, 2005, 小说翻译的语义连贯重构[J],《中国翻译》(3): 37-43。
- 王小荻, 2002, 戏剧、影视剧人物性格化妆造型的手法探索[J],《戏剧》(1): 99-103。
- 严辰松, 1997, 语言临摹性概说[J],《国外语言学》(3): 21-25。
- 于洋欢、董雁, 2020, 译作的“边缘”——从副文本解读白之英译《牡丹亭》[J],《外语与外语教学》(5): 127-138+151。
- 张谷若, 1996,《大卫·考坡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张海涛, 1999, 英汉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J],《中国翻译》(1): 21-23。
- 张伟, 2020, 符号、辞格与语境——图像修辞的现代图式及其意指逻辑[J],《社会科学》(8): 171-181。
- 庄绎传, 2003,《大卫·科波菲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邓联健: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东焯: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
- 收稿日期:2022-02-11
通信地址:53000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

Abstract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Polysemy of Some Translatological Terms (Fang Mengzhi, p1)

Translation studies is a multi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Its terms come from a variety of sources: some are inherited from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theory, some borrowed from related disciplines, some extracted from translation experience, and some translated directly from foreign languages. Different sources of terms may influence the meaning of a term. Based on the compilation of *A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Revised Edition)*, this paper gives a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polysemy of some translatological terms.

On the Interaction of Wai-lim Yip's Cultural Identities with His Thick Translation in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 (Huang Qin & Zeng Huiting, p5)

Wai-lim Yip, a Chinese sinologist, is well known for his scholarship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yet his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on of Chinese poetry deserve more attention. By analyzing the interaction of Yip's cultural identity with thick translation in his *Chinese Poetry: An Anthology of Major Modes and Genres*, this paper found that Yip's diasporic experience leads to his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of being a Chinese writer, sinologist and diasporic translator, which makes him to choose various kinds of thick translation in this translated anthology, achieving the promotion of both the academic value and reception of this version as well as the full display of his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On the Threshold of Text-illustration Interpretation in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f Fou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David Copperfield* (Deng Lianjian & Zhao Dongxuan, p12)

Translating illustrated texts involves both interlingual and intersemiotic renderings. As there may be discrepancies between illustrations and texts, the 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strategy allows translators to add or delete originals with the reference of illustrations to achieve text-illustration interpretation. However, the justifiable threshold should be observed and 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should be put in the primary place. Within the justifiable threshold, by following the "text-based" principle, translators can identify the meaning of words and supplement the text with illustrations. If translators follow a "illustration-based" principle and produce new meanings entirely by interpreting illustrations, they will stand on the unjustifiable threshold of text-illustration interpretation.

Knowledge Mapping Analysis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ies abroad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Database (Bai Limei Cui Tengjiang & Gu Xiangdong, p65)

By using the CiteSpace, a scientometric research tool, this paper visually analyzes the literature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collected by th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of Web of Science from 1997 to 2021, and draws a knowledge map.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foreign linguistic landscape research from six dimensions: annual publication, distribution of journals and disciplines, co-keywords, highly-cited journals, highly-cited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focus, so as to further clarify the knowledge structure of this field. It is found that the foreign linguistic landscape has been on the rise over the past decade; Europe is the major force for this research; the hot topics of foreign linguistic landscape focus on "bilingual, multilingual landscape", "space", "identity", "language policy"; the groups of published journals and core highly-cited journals have been formed; the research frontiers cover a wide range and involve a variety of fields. It is necessary for domestic researchers to critically draw on foreign research result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so as to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research and promote two-way academic dialogue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